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的反思

——基于“协作者”的实践

熊贵彬 王冬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协作者”是我国首个农民工社会工作的民间组织，“非典”时期诞生于北京，至今其服务体系已延伸至南京和珠海。其专业的理念和方法，赢得了新生代农民工及流动儿童的喜爱，获得了民政部的肯定。然而，发展的道路是艰辛的，经费缺乏，收入低下，甚至没有固定的服务场所，需要社会政策的大力扶持。然而新政策落实却很困难，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反思。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协作者 社会工作 社会政策

农民工流动近三十年，现在外出务工总数已近一亿六千万，其中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例近54%。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然而，融入城市的路是艰难的。尽管从政府到民间，重视农民工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却从未停止过。在不少城市人眼中，农民工是弱势的边缘人，是文化素质低、不讲卫生的“愚钝人”，是交通、医疗、教育等有限城市资源的“挤占者”，甚至是犯罪的高发群体。新生代的农民工、农民工子女，非常敏锐地感受到不平等。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2012年10月的报告称，有三成的流动儿童曾感到压抑和被歧视，近六成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可以预见，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还将等待一段较长的时期。帮助其顺利地实现市民化，也使我国城市化之路更加平稳，迫切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协作者，一个支持性民间组织，致力于挖掘农民工自身潜力，逐步走上专业之路，践行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本文主要通过叙事性记述的方式，记录协作者的产生发展、工作方法和面临的问题，进而引出对本土性农民工社会工作的一些反思和讨论。

一、艰难成长之路

“协作者”创始人李涛，曾经是一名记者。从1996年关注农民工问题起，他就意识到，农民工不是弱者。“一个小姑娘，没读过几年书，从四川大山里走进城里，找到工作，养活自己，甚至给家里寄钱供弟妹上学，这是什么样的生存能力？”^①“协作者”要做的，是要帮助农民工有能力

收稿日期：2013-03-28

作者简介：熊贵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

王冬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社会学和社会工作。

① 本文内凡没有注明出处的引证，均属访谈所得。

表达自己的想法,展现自己的才能,堂堂正正成为新市民。

由于难以获得理解,“协作者”注册无门。没有合法身份,很难筹到运作资金,多数时候靠李涛自掏腰包,勉强维持。甚至,连农民工也难以理解“帮我们就行了,我们拿什么帮别人?”在农民工群体中招募志愿者,一度无人响应。在北京协作者的小院儿,陈设颇显陈旧。连一张孩子们活动时的游戏卡片,也是反复使用的。“为了省钱,我们所有的活动材料,大到宣传片,小到活动背板,全是自己制作的。做背板的边角料,也要留下来,可以给孩子们折手工”。

为了让政府和公众了解自己,李涛执著地扮演社会工作资源争取者和政策影响人的角色。他搜罗了做记者时积累的社会资源,四处自荐由“协作者”为政府部门策划与农民工相关的活动。“只能拿命去做事,一点点改变周围人的看法”。为做好一个项目,在办公室连熬几个通宵,对于协作者的每个工作人员来说,都是常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努力逐步获得了民政部门的肯定。2007年,南京市民政局邀请“协作者”在外来务工者集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设立分支机构。2010年,北京协作者终于获得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

对于协作者而言,2012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3月,民政部社会工作司把协作者的小院儿作为实践教育基地。7月,他们组织的农民工民众戏剧《幸福是什么》在南京公演。台下的观众,包括国家部委和南京市民政局、人社局和建邺区政府的官员。谢幕时,南京市民政局宣布,今年将购买协作者面向农民工的社会工作服务。“为此(南京)协作者等了五年,终于等到这一天”。同年,“首届全国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他们精彩的主题发言,获得了经久的掌声。从这一年起,北京、南京和珠海三地,协作者开通了农民工热线,以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服务。

二、专职农民工社工的炼成

社会工作与志愿活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职业性的助人活动,即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工作者长期以此为职业,提供专业服务。其中,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是基本要素。作为草根性的农民工社工组织,协作者工作团队的发展、专业资质的取得,都显示了很多本土化特征。

协作者第一批成员,除了李涛,都曾是农民工。他们被李涛的执著所感染,加入了协作者。最初也谈不上专业资质,只是“在协作者的活动中,我看到更强大的自己,才从志愿者逐渐成为专职社工”,曾经的四川小保姆王海英如此说。李真曾是啤酒厂涮酒瓶的打工妹,靠自学考进大学,又去香港理工大学攻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做过记者,创办过打工女性杂志,对农民工生活有着切身体验和特殊感情,因热爱而执著,目前她已经获得了中级社工师证书,现在她和李涛共同负责协作者的运作。

被感染的还有王瑞海。2000年他19岁,没上高中,跟着亲戚,从河北到北京打工。干过送水工、维修小工、煤球厂工人、保洁员……2003年“非典”期间,他所在的农民工聚居的地下室,一度是被遗忘的角落。李涛带着志愿者,为大家送去已脱销的口罩、体温计和中药,告诉大家,还有人在牵挂他们,不要害怕。王瑞海至今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感动和心跳“从来不主动跟人说话的我,主动凑上去跟他们要了一个地址”。那张纸条,他保留了整整5年。2005年,在一家影楼作助理的他,凭着纸条上的地址,走进了“协作者”小院。从此,成为“协作者”的忠实志愿者,这里让他感到温暖,生活有意义。后来,李涛引导王瑞海,“做合格的志愿者,不能只是干杂活,还要试着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去开展活动、解决问题”。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国家社工师考试,终于成为一名初级社工师。像他这样的农民工出身的社工师,协作者里面还有好几位。2007年,南京协作者设立后,还缺人。李真找到王瑞海,告诉他,社会工作不仅在于学习理论和

考证,更重要的是将理论和方法技巧运用于实践,帮助有需要的对象,服务社会。于是,王瑞海辞掉工作,随“协作者”南下,成为一名专职的农民工社工。

协作者最初的成员,大都是农民工出身,对农民工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直接的经验。开始主要凭着一腔热情,随着服务活动的推展,逐步获得专业资质,最终成为专职社工。由于事务的扩展,协作者近年又招聘了几个大学生社工,组成了十来个人的精干团队。

三、服务的专业性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体现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一系列专业助人方法中及其背后的专业价值观上,如接纳、尊重、包容、个别化、案主自决、保密和非评判等。协作者默默地践行着社工专业理念,“用生命影响生命”将专业方法灵活运用于农民工的日常服务中。

接纳,融入,家的感觉。农民工热线的平易和热情,成为倾诉和咨询的便利窗口。协作者成了一些农民工在城市的第二个家,每次下班后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协作者小院。感觉这个集体亲切,有家的感觉,大家都像亲人。有个农民工同上司沟通出现了问题,情绪很低落,协作者发去信息,给予情感支持,并鼓励她用不同的方式与上司沟通。同时,协作者还做了一些协调和沟通,终于获得了她上司的理解。

平等改变下一代,是“协作者”的切入点。协作者的小院,是附近孩子的课外活动天地。开始几年,只是放学后家里没人照看的农民工子女,现在,很多工作忙的城市父母,也乐志愿者把孩子接到小院里。因为那里总有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功课,组织孩子们游戏,并教一些卫生小知识。李涛说,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平等的意识。

小组的动力,相互增强能力。协作者组织的志愿服务、社区小组活动,使新生代农民工认识了很多的打工兄弟姐妹,相互交流和支 持。鼓励大家更加开放自己,大胆在大家面前介绍自己的故事和经历,突破交往的心理障碍。小院儿里汇聚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打工朋友,各自都有不同的特长,协作者于是鼓励大家相互分享,使参与者增长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为此,王瑞海一板一眼地完成了系列摄影兴趣小组活动。

最具创造性的,也是大家兴趣最高的,当属别开生面的民众戏剧。这源自社会工作方法中的角色扮演,通过扮演再现生活中的场景,使服务对象深化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协作者创造性地将其发展为民众戏剧,农民工将自己的打工故事在舞台上生动地再现出来。并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表演,既丰富了社区的生活,也使城市居民们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效果是明显的,影响在扩大,于是就有了南京的公演。

四、成就背后的忧伤

协作者9年的蹒跚和执著,现在终于获得民政部、学界及农民工及流动儿童的肯定和关注。然而,其成就背后的忧伤,却鲜为人知。

由于组织工友和流动儿童活动的时间通常是中午或周末,引起了一些居民的不满和投诉,南京协作者5年间3次被提供办公用场地的社区居委会“请出去”。这对经常参加活动的农民工及流动儿童影响是很大的,“在4年中,协作者已经搬了两次家。搬家之前,从我家到那里仅需要15分钟。现在要去协作者借书,就要花两个多小时”,一位流动儿童这么说道。

“刚刚打好基础的社区,有所改变的群体,有些只能放弃,从头再来。”几番周折,南京协作者的专职工作人员走了不少。坚持下来的,就是王瑞海,还有两个大学毕业生。工资低,工作环

境艰苦,很难看到效果,是离职者的“苦衷”。北京协作者也在面临类似的状况。至今,王瑞海的家人仍不理解他的工作。一辈子种地为生的父母,不知“社会工作”是啥。他们只希望,身体瘦弱的儿子,能在城里有份安稳挣工资的工作,常回家看看。年轻的妻子,则执意让王瑞海换工作。儿子要上幼儿园,保定的房子还有一大笔贷款,丈夫不仅要实现理想,还要养家。南京的研讨会上,王瑞海一口气提了五条建议,其中最基本的是:社工应当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至少可以满足吃、住、行等家庭基本支出;社工机构应当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能够持续为社会服务。

五、带给我们的讨论与反思

在协作者的带动下,农民工社会工作近年也在壮大,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发起的农民工子弟“学习伙伴”计划。但是,相对于1.6亿的外出农民工和1.833亿的流动子女,农民工社会工作还是杯水车薪。同时,很多问题源自国家制度,需要社会政策的广泛调整,使制度层面的社会政策和服务层面的社会工作更有效地结合,共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近年,“保障农民工权益”,“为农民工服务”,屡见于政府文件和领导发言。然而,依然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声音,“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已经超限,再向农民工放开医疗、住房、养老等城市福利,岂不是要爆炸?”南京研讨会上,与会嘉宾提出这样的疑问。还有专家建议,是否应考虑引导农民工去向二三线城市。同时,一些大城市的主管部门,正以管理者的姿态,阻断农民工的融入。有的城市综合治理委员会在城乡结合部筑围墙、安大门、把路口、设岗亭,人车凭证出入,对流动人口和社会治安进行管理;同时,大量关停农民工子弟学校,不少打工者为了孩子上学,被迫举家迁徙。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异地高考,在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之后,数千万流动儿童终于看到了曙光。然而,稳定的工作、住所和收入、各种保险等条件,以及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由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等限制,则是当头的一瓢冷水。更为严重的是社会排斥。2012年10月底,15岁的“非沪籍”生占某某辍学半年,在家自学英语、数学,并通过微博争取异地高考权利。她第一个在微博上约京沪籍人士就异地高考到上海市教委辩论,“约辩”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然而,“约辩”当天却是以骂战的方式告终。排斥的背后,是利益之争。

综上,社会政策推进缓慢,争议不断,使其落实也困难。同时,社会政策主要着力于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不能取代社会工作个别性、人性化的服务及其在城里人、农民工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作用。因此,时代亟须农民工社会工作的大发展,当然这需要社会政策的大力扶持。日本20世纪经济高速增长30年,通过成立农民协会、维权并提供服务,促使其城市化顺利完成。中国经济也增长30年了,然而三农问题却愈发突出。政府对维权性的农会有很多顾虑,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放手推动服务性的社会工作发展。当前亟须讨论的是:怎样调动农民工集中的城市政府及企业的积极性?如何规范农民工社会工作的服务购买?怎样提升服务的影响和作用等?为此,政府、学界和社会工作实务界有义务携起手来,使这片土壤更加肥沃。

(责任编辑:王俊华)